



中国历代兴亡 极简史

余耀华◎著

看成败

鉴得失

知兴替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中国历代兴亡 极简史

余耀华◎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历代兴亡极简史 / 余耀华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9.8
ISBN 978-7-229-14343-5

I. ①中… II. ①余… III. ①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①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70744 号

中国历代兴亡极简史

ZHONGGUO LIDAI XINGWANG JIJIANSHI

余耀华 著

责任编辑: 周北川
责任校对: 杨 婧
封面设计: 张合涛
装帧设计: 江岑子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 mm×1000 mm 1/16 印张: 21.75 字数: 280 千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14343-5

定价: 45.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读史：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 1

中国从秦朝统一天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间经历了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撇开大分裂、大动荡的三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不论，从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民国来看，历代从兴到亡，或则十数年，或则二三十年，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旧朝代的结束，预示着新王朝的开始，若干年后，新王朝又成旧王朝，再被下一个王朝取代，历史重回起点。风水轮流转，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管窥历代统治者的生存舞台，探寻历代王朝兴亡的轨迹，透过其成败、得失、兴替的表象，探索渐行渐显的内在规律，寻找若隐若现的因果关系，从中可以得到诸多启示与借鉴。

一、著名的延安“窑洞对” 3

二、中国历代兴亡的命运悖论 5

三、兴亡周期律因果探源 9

第二章

三代——兴亡之始 12

夏、商、周三代，一次次黄袍加身，一顶顶王冠落地，尽管各自有着不同的崛起与败亡的原因，但无疑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废兴规律可供追寻。每一次王朝更迭和政权易手，仿佛在上演似曾相识的一幕。有的盛极一时，勃然而兴，迅速崛起，但却好景不长，瞬息而亡。有着强大无比的政权，似乎没有任何力量与之抗衡。兴，何以兴？亡，何以亡？王朝废兴的原因和规律究竟何在，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政权必然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一、文明初始 14

二、夏桀暴政亡国 17

三、“成汤革命” 19

四、纣王无道 23

- 五、周公制礼安邦 27
六、周幽王烽火戏诸侯 33

第三章

秦王朝——勃兴猝亡

37

秦帝国统治时间仅15年（前221—前206年），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乃昙花一现，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其在政治体制、经济建设、军队管理、吏治建设等方面的实践，都具有开创性。南宋理学家朱熹说，大凡以前没有人做过的事情，要做开创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秦王朝虽然国运短祚，但无论其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对于后世来说，都弥足珍贵。其在如何防止官僚队伍的腐败化，保证官僚机构高效、有序运行这一历代王朝所面临的永恒课题方面，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研究、思考和借鉴。

- 一、短祚王朝 39
二、“焚书坑儒” 41
三、《为吏之道》 45
四、伟大的创举 47
五、民心为何缺失 49
六、秦朝兴亡的启示 52

第四章

大汉王朝——在辉煌中走向灭亡

54

汉朝分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西汉以汉武朝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刘邦立国后，推行轻徭、薄赋、节俭、省刑的惠民政策，又经文景两朝近40年的经营，政权达到黄金时代。汉武帝虽然是一位英主，但在东征西讨之时却又奢侈无度，将文景时期积累的财富挥霍一空，使得臻于极盛的武帝朝实际成为西汉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武帝晚年虽然也表示悔过，但民众对刘氏皇室已失去了信心，以致出现王朝戏剧性易主。

东汉以汉和帝末期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统治者特别重视对官吏的选拔，通过察举、贤良对策等方式选取贤才，吏治比较清明。

后期皇帝都是年幼即位，被外戚、宦官玩弄于股掌之中，社会黑暗，吏治败坏，社会风气日益腐败。王朝逐渐走向灭亡。

- 一、汉初“无为而治” 56
- 二、“文景之治” 64
- 三、汉武帝自毁 69
- 四、王莽篡汉 79
- 五、“光武中兴” 88
- 六、走向灭亡 93
- 七、汉朝兴亡的启示 98

第五章

隋王朝——兴于俭亡于奢

101

隋朝是在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后建立起来的统一王朝。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之后，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建立起一套较为严密的制度。如中央政府的三省六部制，地方政区的州、县二级制，选拔人才的科举制，以及地方官由中央任免制等等，无不与吏治建设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杨坚统治时期，政治清明，经济文化发展也很快。

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一反乃父节俭的作风，大兴土木，不但破坏了文帝时期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耗尽了隋文帝积累下来的财富，还玩丢了隋文帝辛辛苦苦开创的大隋江山。

- 一、短祚王朝 103
- 二、隋文帝节俭治国 104
- 三、隋炀帝的功与过 112
- 四、隋朝兴亡的启示 117

第六章

大唐帝国——从神话中的坠落

118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共289年。唐朝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向上发展时期，后期则为日渐衰落时期。唐代前期包括从唐高祖李渊建唐起，到唐玄宗李隆基末年止，经历了

7个皇帝，共130年。这段时期，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取得了较高成就，唐高祖李渊、武则天和唐玄宗李隆基统治的前期，也都有许多称道的地方。但此后的唐王朝则陷入吏治败坏，军阀混战的泥潭难以自拔，致使大唐帝国的神话迅速走向破灭，大唐帝国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 一、唐初的吏治 120
- 二、“贞观之治” 122
- 三、唐高宗并非一无是处 134
- 四、武则天铁腕治吏 139
- 五、唐玄宗前后判若两人 142
- 六、帝国神话的破灭 151
- 七、唐朝兴亡的启示 161

第七章

大宋王朝——物欲横流的时代

164

宋朝有320年的历史，从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篡夺后周政权，建都汴梁，到“靖康之乱”，宋廷统治者从江北逃往江南，栖息临安，直至“崖山海战”，陆秀夫背赵昺跳海自尽。建都汴梁的宋廷史称“北宋”，栖息临安的宋廷史称“南宋”。

宋朝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全被物欲横流的气氛所笼罩。中国古代吏治败坏不仅在政治上与专制政体联系密切，在思想上与物欲横流也息息相关。专制和腐败是一对孪生兄弟，专制体制必然产生腐败，腐败必然依赖于专制体制。专制为腐败滋生提供条件，物欲横流推动官场腐败进一步恶化。

宋朝极贫，不是经济不发达，而是政府将巨额财富进贡给了异族；宋朝极弱，不是没有军队，而是军队没有战斗力，将帅只知敛财，不识战阵。指望一支腐败的军队保家卫国，那是天方夜谭了。

- 一、物欲横流的时代 166
- 二、太祖、太宗对吏治的贡献 170
- 三、“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 177
- 四、北宋后期积重难返 187
- 五、南宋吏治败坏失江山 190
- 六、宋朝兴亡的启示 202

第八章

元朝——最无制度的朝代

206

蒙古乃马背上的民族，对汉文化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们于马背上得天下，却又希图在马背上治天下，由于对儒家文化缺乏认知，导致治国理论出现缺失，政治制度少有章法，故被后人称为“最无制度”的朝代。

蒙古的兴起和元朝的建立，使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元朝承辽金之遗法，揽南宋之制度，结合本身之习俗，形成其独特的政治体制，在吏治建设方面，元朝自成体系，特别是在官吏监督方面颇有建树。但元朝国祚较短，而且对官吏贪赃枉法、搜刮聚敛缺乏有效的制裁措施，吏治腐败程度较为严重。

- 一、最无制度的朝代 208
- 二、元初吏治逆天而行 210
- 三、贪风四起与吏治整顿 215
- 四、元朝后期的社会腐败 220
- 五、元朝兴亡的启示 225

第九章

明朝——整饬吏治高歌猛进

230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惩治贪官污吏力度最大、用刑最酷、杀戮最多的一个朝代。掀起这股反贪风暴的人是开国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疾贪如仇，除贪务尽，声称要杀尽天下贪官，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杀皇侄、惩驸马、戮勋臣、处窝案，向贪官污吏打出惊世骇俗的组合拳，为明初赢得了一百多年吏治清明的安定局面。

明朝中、后期，朱元璋及其后继者苦心经营起来的反贪机制逐渐遭到破坏直至全面瘫痪，基本上失去防腐反贪的作用，结果出现贪官污吏横行天下的乱局。当崇祯皇帝铲除以魏忠贤为首的最大贪污官僚集团之后，大明王朝这座大厦已从头烂到脚，再无回天之力。

- 一、明太祖严惩贪官污吏 232
- 二、明成祖倡廉肃贪 249
- 三、“仁宣之治” 251

四、英宗时期为拐点	254
五、中后期的吏治	258
六、明朝兴亡的启示	284

第十章

清朝——君主专制最后一曲挽歌

286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当时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完成向封建化的过渡还为时不久，大清贵族还保持着封建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的某些朝气，同时也保持着八旗制度下贵族之间的某些民主。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又都是励精图治的皇帝，因此出现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稳定发展时期，这就使清朝统治者有较充分的条件与可能，总结历代封建统治者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加强和巩固其统治。实行廉政，整饬吏治，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已是日薄西山，封建社会的一些弊端积重难返，这些弊端爆发之后如溃堤之水，势不可挡地泛滥成灾，最终葬送了大清王朝。

一、谁葬送了“康乾盛世”	288
二、腐败与烟毒交相为恶	307
三、侵吞军费酿国耻	315
四、光绪不做亡国之君	321
五、最后一曲挽歌	326
六、清朝兴亡的启示	336

第一章 绪论

读史：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

中国从秦朝统一天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间经历了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撇开大分裂、大动荡的三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不论，从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民国来看，历代从兴到亡，或则十数年，或则二三百，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旧朝代的结束，预示着新王朝的开始，若干年后，新王朝又成旧王朝，再被下一个王朝取代，历史重回起点。风水轮流转，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管窥历代统治者的生存舞台，探寻历代王朝兴亡的轨迹，透过其成败、得失、兴替的表象，探索渐行渐显的内在规律，寻找若隐若现的因果关系，从中可以得到诸多启示与借鉴。

一、著名的延安“窑洞对”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6人到了延安，这些人不是来延安游山玩水的，而是应邀前来做客的。

延安方面非常重视这批尊贵的客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林伯渠、张闻天、邓颖超、杨尚昆、陈云、陈毅、刘少奇、彭真、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贺龙、陆定一等一些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集体出动，赴机场迎接这些贵宾。

中共领导人向这些民主人士表示，延安敞开怀抱欢迎他们，无论是机关、农舍，还是市场，贵宾们可以自由参观，不受任何限制。

几天之后，黄炎培发现，延安方面对他们真的没有任何限制，没有出现在重庆常紧随其后的“尾巴”；行走在延安街头的人们，人人气色红润，个个精神饱满，没有发现游手闲荡之人，也没有面带烟容的颓唐之人。街上没有标语，但有黑板报，黑板报上介绍的是卫生知识。印象最深的，是延安街上的意见箱。每个延安人都可以投书，上书建议直至毛泽东。他还发现，延安的人们对毛泽东大多是直呼其名，一般不连带他的头衔。

访问结束临离开延安时，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有一次精彩的对话。当时，毛泽东问黄炎培，这次到延安访问，有何感想。

黄炎培回答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的性情发作，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

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殆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了解了些，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当时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对于毛泽东的回答，黄炎培后来写道：“这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望才不致发生。只有把每一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这段对话，便是著名的“窑洞对”，直至今日，仍然被人们广为引用。

为了永不松懈，跳出“周期律”。1949年3月，毛泽东又在西柏坡会议讲话中，极富预见性和前瞻性地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述，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是人民书写的历史。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

习近平同志指出，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走好脚下的路。

二、中国历代兴亡的命运悖论

中国历代廉政建设,为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探索值得肯定,成果需要总结,经验可以借鉴。然而,在中国历代廉政制度的发展进程中,却始终无法摆脱自身命运的悖论。诸如“周期律”、“矛盾律”、“背反律”这样一些带有普遍性、必然性、规律性的历史现象,仿佛与传统廉政制度结下不解之缘。历史的悖论难题,更值得让人深思破解。

(一) 关于“周期律”现象

透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历代王朝的兴亡,许多现象似乎是在重复走过一条相同的路,统治者生时的忧患,存时的百态,衰时的落寞,亡时的悲泣,许多是那么的相同或相似。旧政权的灭亡,新王朝的兴起,不过是新一轮循环往复的开始。这种“周期律”现象,仿佛是一个永远走不出去的“怪圈”。既然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当然就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如果从历代吏治建设与“周期律”二者关系的角度考量,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究“周期怪圈”的视野:

历史的发展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违背社会规律必将遭到惩罚。在遭到无数次惩罚之后,吃一堑长一智,或许能做出相对明智的选择。正是在这样的经历之后,中国古代统治者都能作出整肃吏治、加强自身廉政建设的必然选择。这就是传统的吏治,抑或廉政建设历史合理性之所在,即历代统治者的廉政建设不得不为之,不如此,轮回周期将会更短,本轮“怪圈”的终结将会快速降临。强盛一时的秦帝国仅二世而终,威名赫赫的隋王朝历两代而亡,血淋淋的前车之鉴,促使后来统治者为了延长自己的统治周期,不得不在吏治上做文章,

加强政治改革，推行廉政建设。如此，新一轮“周期怪圈”开始。

传统的廉政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表社会进步的一面，但其本质毫无疑问是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代表的进步性是相对的、表面的、有限的，代表的本质性则是绝对的、实质的、无限的。这就决定了传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进行，但又不可能进行得彻底。两种力量相持，两种作用并存，其作用大小、强弱并不平衡。历史的合力，驱动“周期怪圈”前行，只能沿着既定的弧形轨迹，小幅度波浪似的前进，终极目标只会是本轮“周期怪圈”的终结，历史又回到原先的起点。

传统的廉政制度，只是一项具体政治制度，并且是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之内产生并为之服务的具体制度。这就决定其必然无意与根本制度相抵触，而传统廉政制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旦与根本制度出现背离，必将遭到根本制度的否定。这就决定了传统廉政建设不可能进行得彻底，也不可能持久地进行。廉政建设的受阻，使得“周期怪圈”的弧形轨道加速轮回。旧的轮回结束，新的周期开始。

“周期律”现象，反映了传统廉政建设过程中的运行表象的规律。之所以在运行表象上出现“周期律”现象，则与中国传统廉政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密切相关。“周期律”与“矛盾律”携手共存，都是中国传统廉政制度无法摆脱的命运悖论。

（二）关于“矛盾律”现象

中国传统廉政建设面临着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其中最根本的矛盾当然是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冲突。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政权，势必要维护统治阶级自身的利益，不可能真正为人民大众谋福祉。这就使得传统的廉政建设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强化廉政建设，就要对国家政权以及统治集团成员的政治行为给予某些约束与限

制，这样势必会触犯某些人的既得利益，甚或危及他们的生存。另一方面，强化廉政建设，又是维护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反过来说，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需要相应的廉政制度加以维护，但这种维护又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廉洁政治，势必会冲击王朝政权的根本利益，甚至危及王朝的统治基础。这种“矛盾律”的现象，从根本上决定了传统廉政建设必然会出现以下一些矛盾现象。

“真反贪”与“假反贪”的矛盾。贪赃是历代官场根深蒂固的痼疾，历代统治者也心知肚明，当这个痼疾严重到危及政权存亡时，最高统治者会摆出大力惩贪的架势，制定一些惩贪措施，严惩一批贪官污吏以儆效尤。此时的反贪决心和惩贪措施不能说不真。但真中亦有假，真也会转化为假。统治者的反贪行为，可能只是意在安抚民心的姿态性表演。惩贪规定也可能只是表面文章。因为君主与官僚的利益相一致，君主需要臣子为己卖命，若法网过紧，则寒了臣属之心，心寒则人心离散，因此，君主只求臣属“忠君”，不一定要臣属为官清廉，只要没有政治野心，贪财好利不是一件要命的事情。王翦自污，秦始皇高兴，萧何自污，刘邦放心，就是这个道理。

“前严酷”与“后宽松”的矛盾。前紧后松，虎头蛇尾，以严惩反贪开始，以宽容放纵结束，这也是传统廉政建设过程中常见的矛盾现象。历代封建王朝的反贪努力，既不彻底，也不能持久，同一朝代，也存在前严后宽的矛盾现象。如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之后，以严刑峻法严惩贪官污吏，朝政为之一清。然而仅隔几代，在位的明朝皇帝便政务荒殆，吏治宽纵，“太祖之法蔑如矣”。唐太宗发出“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之问，看来古人早有所察。即使同一位帝王，也存在前严后宽的矛盾现象。如清代乾隆皇帝，前期惩贪如秋风扫落叶，仅三品以上大员以贪赃罪被处死者达数十人之多，但后期

却吏治松懈，导致贪贿成风，在他的眼皮底下，甚至出现了和珅这样的巨贪。甚至同一件案子，也存在前严后松现象。如甘肃藩司王亶望、山东巡抚国泰的贪污大案。乾隆皇帝先是下令彻查，后因牵涉官员太多，又以顾及“国体”、“颜面”为由，不愿再兴大狱，查案工作半途而废，非但不再深究，甚至对多数涉案官员也从轻发落。

“边反贪”与“边贪污”的矛盾。有人说，中国一部 24 史，就是一部贪污史，此言不虚，但也要补上一句：中国一部 24 史，同样也是一部反贪史。历朝历代贪污不绝，历朝历代也反贪不止。这正是中国传统廉政建设“矛盾律”的一个重要表现。反贪为何效果不彰？原因是多方面的，或因只反小贪，不反大贪，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或因官官相护；或因执法者自贪；或因皇帝优容包庇，不予追究；等等。不论何种原因，归根到底就在于中国传统廉政制度的“矛盾律”决定其既无心回天，也无力回天，不可能彻底根治贪污腐败问题。

（三）关于“背反律”现象

中国传统廉政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一种“背反律”现象。表现为：制度规范与制度失范的背反，制度初衷与制度变异的背反，朝廷“明规范”与官场“潜规则”的背反。

中国历代国家统治者制定廉政制度的本意在于规范官吏的行政行为，但在实际执行中，相关规定又常常遭到破坏，制度本身的规范作用难以发挥。同一个违法行为，同一件贪赃罪行，是否追究，何时追究，追究到何种程度，实际上取决于当政者的主观意愿。制度的制定者，往往又是制度的破坏者。这种背反现象，势必弱化制度的约束效力。

在中国传统廉政建设过程中，创立某些制度的初衷或许是出自廉政的意图，但制度本身的发展却导致出南辕北辙的结果。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创行的“九品中正”选官制度，初衷无疑是“唯才是举”，结